

乡土史记

艺苑大观

诏安土楼与客家宗族

□李积庆 文/图

古厝生花:

闽台传统建筑装饰中的花卉

□王丽君 文/图

诏安土楼大多建于明清时期,这种大型生土建筑兼具居住和防御功能,是福建土楼中重要的一支。至今在诏安的北部山区,仍矗立着数百座形状各异的土楼,在岁月洗礼中诉说着客家宗族往日的荣光。

筑楼自保

建筑既是历史的载体,也是历史的产物,诏安土楼的兴起与流行,同地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明代中叶以后,海盗与山贼在中国沿海屡为患,诏安僻处边陲海隅,当闽粤要冲,屢遭侵扰,土楼因能有效御敌而逐渐兴起。

清康熙《诏安县志》曾载:“自(明)嘉靖辛酉以来,盗贼生发,民自为筑,在有之。”“嘉靖辛酉”即嘉靖四十年(1561年),正是倭寇猖獗之时,沿海各地倭患频仍,官府应接不暇,民间只得筑楼以自保。

诏安等地的土楼自明代中后期兴起,到清代中期达到鼎盛。明万历《漳州府志》曾指出“漳州土堡,旧时尚少”,而在嘉靖倭患以后,“民间团筑土围,土楼日众”。清道光八年(1828年),湖南人陈盛韶担任诏安知县,他看到了诏安客家地区普遍筑土楼以及客家人聚居而居的盛况,其《问俗录》写道:“二都无城,广筑围楼。墙高数仞,直上数层,四面留空,可以望远。合族比栉而居,由一门出入。门坚如铁石,器械毕具。”“广筑围楼”可以间接说明土楼已经成为诏安客家人的主要民居形式。

古代的诏安二都大致等同于今天诏安县客家话的使用范围,官陂、秀篆、霞葛等乡镇至今仍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元末明初,许多客家人从闽西地区迁入二都,在偏远的山区,齐整的器械加上高耸厚实的夯土墙,让客家人抵御了倭寇、山匪的骚扰,并在族群竞争中不断扩大地盘。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客家族群已遍布诏安北部山区,各大家族姓传播甚广,如今台湾地区诏安客家的后裔已经超过了祖籍地客家人的人数。

开基立业

诏安客家山区山多地少,谋生不易,创业艰难,故为家族修筑土楼,堪称伟业,事迹足以载入族谱。

对开基建楼的祖先,族谱中常不吝赞美之辞,如《秀篆游氏家谱》曾赞十世祖先游先根“善于创业,而明于事机,才调出类”,并详细记载其事迹:游先根年少好学,略通风水,20岁时觉得良地,只因“家道未殷,不得已弃学力耕积”,耕耘树艺,直到35岁时“家资有千,遂营地基并后龙山,兴建虎坑楼,日夜经营,天必默护,不日成功”。经过十几年的克勤克俭,苦心经营,游先根终于在清康熙乙酉(1705年)建成虎坑楼。

游先根之妻李六娘“日织夜纺,以勤致富……至中年,助建虎坑楼,夙夜供工,何有何无,龟勉求之”。李六娘是客家妇女勤俭贤淑的典型代表,她本为武官干总之次女,却不在乎夫家往日之有无,尽心操持奔忙,在虎坑楼的修建过程中不可没。

在田楼,当地俗称大楼,直径达94.5米,房屋共有320间,是官陂镇最大的土楼,为张廖家族十二世的七个兄弟于清乾隆年间合力建造。在田楼大门有藏头“在田”的对联:“在昔经营曾九二初启宇,田庐居处兄弟四三始创楼。”一副对联勾勒了家族史,上联纪念十一世祖益坦公开创业之功,“九二”之和即“十一”;下联说明七兄弟棠棣联辉,同心协力共造大楼,“四三”之和即为“七”。“在田”“九二”取自《周易》文中的“九二,见龙在田”,建筑布局遵照《周易》八卦形制巧妙设计,别具用心。

与虎坑楼、在田楼一样,数以百计的诏



官陂镇凤狮村的凤山楼



凤山楼中央的“仪式堂”

安土楼无不是父子同心、夫妻同道、兄弟同德、宗族同力的结果,它们见证了客家人艰辛创业的历史。

聚族而居

在传统农业社会阶段,一座土楼通常代表着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合起来的生产、生活单位。

诏安土楼一般高两三层,以隔墙分成一个个单元,每个单元从楼下至楼上,自成单元。各个单元多采用“两落一天井”的建筑形式:前落多用作厨房,后落下层多用作客厅、饭厅,上层则作住房,中间有天井,从而构成一套相对独立的生活单元。

诏安土楼属于“单元式土楼”,与永定、南靖等地常见的“通廊式土楼”相比,其建筑内部格局有较大区别。“单元式土楼”最大的特点是将土楼分割成若干居住单元,各单元有一个楼梯直通上下,各住户拥有住宅单元的地面层至屋顶所有空间的使用权。而“通廊式土楼”则需共用楼梯上下楼,并通过各楼层的走廊才能走到自己的房间。

除了诏安外,邻近的平和、云霄,以及广东的饶平、大埔等地均有“单元式土楼”出现。“单元式土楼”更加注重独立性和私密性,满足了家族房支分化后住户新的居住需求,是“通廊式土楼”在传播过程中发展演变的结果。

在土楼内部,通常有共同使用的水井、晒谷场以及风车、谷磨、石磨等公用设施。大多数土楼设有祠堂,通过岁时年节的祭祀,以纪念祖先功德,并勉勵晚辈奋发图强,光宗耀祖。有的土楼的祠堂设在大门正对面的一个楼内单元,如官陂镇大边村水美

楼的“庆德堂”、在田楼的“济德堂”、玉田楼的“燕翼堂”。有的土楼则在楼中央另盖一座祠堂,如官陂镇凤狮村凤山楼的“仪式堂”。

凤山楼是一座直径达71米,拥有42间开间的大型单环圆楼,为官陂张廖氏第十三世张绍安于清雍正四年(1726年)建造。土楼中央的“仪式堂”为两堂制,进深三间,由下厅、两厢、中天井、拜亭、大厅组成,建筑面积达200余平方米。祠堂为歇山顶式建筑,雕梁画栋,装饰精美。客家人提倡耕读雨读,重视文化教育,旧时许多祠堂还兼作书塾或学堂,供族中子弟就读。

诏安土楼前一般都有圆形或半圆形水塘,如凤山楼前的巨大水塘占地面积达2100多平方米,水塘既可作消防等用水,又可收地势风水之效,体现了诏安客家人的风水观念。土楼周围有各家族的土地,也有公共的田园和山林。以土楼为中心,客家人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产、生活、文化教育设施一应俱全,一座座土楼就是一幅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图景。

聚落成村

如今在诏安客家地区,有许多自然村以土楼作为地名,如官陂镇大边村的大楼和玉田楼、凤狮村凤山楼和龙头楼、霞葛镇嗣下村嗣昌楼等,土楼成为宗族繁衍成聚落的外化象征。

当土楼家族繁衍成为大家族,因应人口增加,土楼或者扩建出护屋,在土楼外围另有包覆弧形土楼,形成向心形的多重土楼;或另择他地兴建新的土楼,从而形成具有紧密宗亲关系的土楼群。

秀篆镇寨坪村的半月楼是扩建护屋的典

型土楼。半月楼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初时规模较小,随着家族生齿日繁,原先土楼居住空间不敷使用,族人因地制宜由内向外扩建护屋,历经300多年,将土楼增建成为一座里外五圈、拥有300余开间的大型土楼。整座土楼建在平缓的山坡上,背靠大山,面向田野,前低后高,以“云端堂”祖祠为中心,呈马蹄形环环相套,远远望去,宛若孔雀开屏,蔚为壮观。

官陂镇大边村土楼群是宗族房支分彙、延续兴盛的反映。土楼群以在田楼为中心,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水美楼、石马楼、玉田楼、玉峰楼等12座土楼。这些土楼大多建于清代中后期,主要由诏安官陂张廖氏十二世、十三世两代族人建立。在短短数十年间,建立如此之多的土楼,足见当时张廖宗族势力之强大,人丁之兴旺。据传,张廖氏子孙每迁到一个新的村庄,均会设法构筑土楼以作栖身之所,以至人口繁衍越快,土楼也建越多。据统计,张廖六世共四房,各房裔孙所建土楼,多则二十座,少的也有六七座。

玉田楼、玉峰楼为内外双圈土楼,建造者具有紧密的宗亲关系。玉田楼为张廖姓十二世德宽公儿子中的大、三、五房兴建并平均分配居住,据说玉田楼因祖先挖地基时发现大玉宝藏而得名。玉峰楼围绕在玉田楼外围,由三房独立兴建,仅供三房派下居住。相传大、三、五房商讨兴建玉田楼时,三房媳钟氏在旁听到了只言片语,误以为三房利益会受到损害,因此连夜在玉田楼预留地外再围出一座土楼范围。

后世族人关于玉田楼、玉峰楼建造传说颇具传奇。祖先挖到宝藏概率实际上很小,类似的传说更多是子孙对祖先不可思议地创下功业而进行的美好解释。玉峰楼连夜围出地界的传说,背后反映了宗族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事实:由于各种原因,宗族房支分彙不可避免地出现强弱支,人多财旺的房支有需求与能力增建更多的土楼。所以,对于客家人而言,土楼不仅是家族居住生活的空间实体,还是宗族延续兴盛的精神象征。

作为曾经重要的民居形式,诏安土楼见证了客家宗族的发展与变迁,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土楼是客家先辈智慧和汗水的结晶,也是客家人裔祭祀访亲的乡愁记忆所在。许多珍贵的土楼或日益倾颓,或因闲置而出现了“土楼空心化”的现象,土楼如何保护并加以活化的问题,值得重视。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说史谈潮

王景弘下西洋对福建海洋文化的贡献

□苏健涵

“闽在海中,西北有山”。福建依山傍海的资源禀赋造就了闽人越山闯海的历史活动,其中八闽儿女因海洋生成的物质表象和精神内在整体,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福建海洋文化。纵观山海互动的历史沿革,王景弘下西洋是福建海洋文化生成与传播的典型范例。

回顾历史,王景弘在1405年奉明成祖之命协助郑和出使西洋,郑和去世后,又奉旨第八次出使西洋。王景弘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影响深远,这一历史进程也从价值取向、内在动力和重要保障三个维度为福建海洋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海纳百川的包容胸怀是福建海洋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华文明自古倡导多元文化汇聚、化解冲突和凝聚共识的价值理念,不以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内容为界限,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一内在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通过海上活动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福建海洋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胸怀。

岸,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以和平互鉴的方式,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争取了更广阔的空间。据《明史》记载,王景弘下西洋远航访问过的许多国家,先前与华夏文明从未有过交流,船队到访后才知道有中国,随即相率来朝贡。

台湾海峡是王景弘下西洋必经海域,据记载,王景弘曾两次去过台湾,并为台湾人民干过不少好事。《台湾府志》记载:“相传明太王三保投药水中,令土番染病者水中洗澡,即愈。”《香祖笔记》记载:“凤山具有姜,名三宝姜,相传明初三宝太监所植,可疗百病。”

可以说,王景弘下西洋是闽人闯海、面向世界的历史缩影,推动形塑了福建海洋文化的包容胸怀,体现了福建儿女对外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取向。

二是乘风破浪的执着信念是福建海洋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围绕海洋而进行的一系列物质与精神的实践,是人们认识海洋的现实途径,也是海洋文化生成与发展的逻辑原点,也是人们在思想层面坚定对航海活动的执着信念,不因海洋复杂的水文环境、海外陌生的人文环境和海洋生存的困难环境

等因素,停止对海洋的探索活动,才能不断推动海洋文化向前发展。

王景弘下西洋期间曾经历多重困难与挑战,包含建造航船、训练水手和出海作战等多个环节,还负有歼灭海盗、维护民族利益和沿海安全稳定等重要使命,若没有确立对航海事业的执着信念,难以完成时间跨度和规模如此巨大的航海壮举。在第七次下西洋之际,明宣宗亲撰长诗赠王景弘,“昔时将命尔最忠,大船摩曳冯夷宫。驱没飞廉决鸿蒙,遍历岛屿凌巨洪”,充分肯定了王景弘的历史功绩,也侧面体现出王景弘的坚定信念。

王景弘下西洋的精神事迹也在民间广为流传,明清以来众多演史杂剧对其进行文化演绎,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奉天三保下西洋》《南洋记》等古书戏剧中有叙写王景弘攻克水文奇象、遭遇神异怪异的故事,反映了民众对其精神的肯定与崇拜。

可以说,王景弘下西洋这一历史活动体现出的精神特质,催生民间英雄崇拜和探索海洋的文化现象,促进了一代代闽人确立勇于探海闯海的执着信念,为福建海洋文化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

三是远征海洋的科技智慧是福建海洋

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华先贤通过航海实践活动认识海洋,探索与建构出海洋相关的科学技术,改变了传统生产活动的方式,提升了航海实践活动的发展水平,也影响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前进方向。

宋朝以来,福建是中国航海活动的中心,王景弘是福建漳平人,自幼受福建海洋文化影响,对航海技术具有浓厚的兴趣,在下西洋航队中出任技术方面的统领,负责船舶的征集、航海人员的选拔训练以及航海路线的确认等具体的技术事宜。在明宣宗朱棣基所作的《赐太监王景弘》诗中,突出对王景弘航海技术和率领庞大船队功勋的赞赏,体现其对船队海洋技术的重要贡献。王景弘晚年还撰写《赴西洋水程》航海实用手册,对航海路线、技术原理和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包含水文现象识别、航海仪器使用以及船队日常管理等内容,《赴西洋水程》一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当时人们的航海“秘本”。

总体而言,王景弘对航海技术探索的历史活动,促进了福建儿女掌握关于海洋的科学规律,推动了海洋生产活动方式的变革,为福建海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台南南鲲鯓代天府“一路连科”石雕作品



晋江梧林显福宅角门“培兰”石部门窗